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东亚奇迹与 “强政府”

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

李 晓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东亚奇迹与“强政府”

——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

李 晓著

10132105

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东亚奇迹 —
李 晓 著

责任编辑：陈 捷
责任校对：段健瑛
封面设计：卜建晨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舒天安

东亚奇迹与“强政府”
——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

李 晓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胶印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7.75印张 200000字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058-0967-9/F·729 定价：11.4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李晓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ISBN 7-5058-0967-9

I. 东… I. 李… III. 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东亚 IV.
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9661 号

代 序

池元吉

李晓同志的专著《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深感欣慰和高兴，并表示热忱的祝贺。

李晓同志的这部专著，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论文答辩中，由校内外七位博士导师和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文“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及其模式方面的一篇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一篇优秀的论文”。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我觉得这部著作的开拓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在认识论上，作者突破了以往西方发展经济学只注重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各种有形要素及其配置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框架，着重从分析和研究政府在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功能入手，探讨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和过程，将东亚经济的起飞与发展视为“后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过程”，从而使研究视野超出了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建立在制度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家只着重从先进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先验立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局限性，注重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对东亚经济与拉美经济进行比较分析，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二) 作者对“东亚模式”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在分析批判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东亚模式”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体制模式”、“综合的现代化模式”、“文化模式”等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于，在共同或相近的历史或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认为这种“强政府”不仅以较高乃至极高的“政府强度”，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起飞、增长和缓和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政府质量”高低是后进国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强政府”的本质内涵。

（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和论述了“政府替代”问题。认为后发展国家在起飞和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方面面临着不发育和残缺的市场，一方面面临着赶超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这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只靠市场机制的自发功能实现既定目标。“东亚各国、各地区政府理性地和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对一部分不发育或残缺的市场机制的替代功能，即采取扭曲相对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等方式，迅速地培植起一批主导性产业部门及其相应的企业组织，使其承担起政府规划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重任，从而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而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政府又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其替代功能，从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开始更为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替代强化—→经济增长和市场发育—→政府替代弱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特有的动态模式。在这方面，作者的一些理论创新和观点，如针对互惠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等，都颇有新意和见地。

（四）作者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并未仅仅囿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在此基础上从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分析角度，研究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关系。围绕

制度创新、供给及其实施机制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较详尽地分析了“政府自律性”问题。指出“强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且得到一个集中统一的主要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是一个能有效遏制“寻租活动”的廉洁清正的政府。

目前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它主要强调政府应顺应市场的发展，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发展经济学忽视制度分析的不足，但它们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为对象的，忽视对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李晓同志令人信服地指出并分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一矛盾状态，提出应当将发展经济学同制度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

李晓同志围绕东亚经济发展问题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发展经济学的革新和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因此，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将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建立和政治经济学的革新、丰富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李晓同志在著述中并未直接提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经济比较分析和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参照系深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目前，我国正在从事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开始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起飞。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史无前例和世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产生和遇到了不少障碍和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中，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政府职能转换中，真正地提高政府的质量；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保持政府的廉正。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李晓同志在书中所揭示的东亚经济起飞和发动

经济增长中的“强政府”问题、“政府替代”问题、“政府自律性”问题等，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如果我们能够在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上科学地、切实地加以规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关系，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最后应该指出，李晓同志的论文既然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探索性，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成熟、不周密之处。这有待于李晓同志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加以补正，更有待于读者不吝赐教和指正。

1995年12月于吉林大学

绪论 东亚模式

近些年来，研究“东亚模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之一。这是因为，从6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的日本、ANIES^①、ASEAN（东盟，下同）和中国，相继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东亚经济迅速实现了起飞，并在欧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日益显示出旺盛的增长势头，创造了现代后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奇迹（参见下表）。

东亚地区与欧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年平均增长率，%）

| 国别、地区 | 实际 GNP(GDP) | | | | | 制造业生产(c) | |
|----------|----------------|----------------|----------------|-------------------|--------------|-------------------|-------------------|
| | 1960~ 1970年 | 1970~ 1980年 | 1980~ 1985年 | 1985~ 1990年(a) | 1991年 (b) | 1980~ 1985年(d) | 1985~ 1990年(e) |
| 亚洲 | | | | | | | |
| 日本 | 10.5 | 4.7 | 3.8 | 4.7 | 4.0 | 3.6 | 4.7 |
| 中国 | 4.0 | 5.7 | 10.1 | 7.9 | 7.0 | 12.1 | 14.6 |
| ANIES(f) | — | 9.1 | 6.8 | 8.6 | 7.4 | — | — |
| 韩国 | 8.4 | 8.2 | 8.4 | 10.8 | 8.5 | 10.8 | 13.3 |
| 香港 | 10.0 | 9.3 | 5.6 | 7.8 | 4.5 | 5.8 | 6.2 |
| 台湾 | 9.6 | 9.7 | 6.8 | 9.2 | 7.4 | 6.5 | 6.2 |
| 新加坡 | 9.2 | 9.0 | 6.2 | 7.9 | 7.5 | 1.2 | 12.7 |
| ASEAN(f) | — | 7.5 | 6.7 | 6.8 | 6.0 | — | — |
| 印度尼西亚 | 3.9 | 8.0 | 4.7 | 6.3 | 6.0 | 8.7 | 13.0 |
| 马来西亚 | — | 8.0 | 4.8 | 7.5 | 8.5 | 6.7 | 10.9 |

① 为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的缩略，即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主要指亚洲“四小龙”，下同。

续表

| 国别、地区 | 实际 GNP(GDP) | | | | | 制造业生产(c) | |
|---------|----------------|----------------|----------------|-------------------|--------------|-------------------|-------------------|
| | 1960~ 1970年 | 1970~ 1980年 | 1980~ 1985年 | 1985~ 1990年(a) | 1991年 (b) | 1980~ 1985年(d) | 1985~ 1990年(e) |
| 泰国 | 8.3 | 6.8 | 5.5 | 10.0 | 8.1 | 0.4 | 14.2 |
| 菲律宾 | 5.2 | 6.3 | -1.0 | 4.6 | 0.8 | 19.2 | 14.8 |
| 北美 | | | | | | | |
| 美国 | 3.8 | 2.8 | 2.6 | 2.8 | -1.2 | 3.1 | 3.7 |
| 加拿大 | 4.8 | 4.5 | 2.9 | 3.1 | -1.7 | 3.0 | 1.0 |
| EC(欧共体) | 7.8 | 4.5 | 2.2 | 4.5 | 1.4 | -0.0 | 2.8 |

注：(a) 各国统计数字为实际 GDP，EC 为 1985~1989 年平均。

(b) 各国统计数字为实际 GDP。

(c) 加拿大、中国、马来西亚、EG 为工矿业生产指数；台湾以 1981 年和 1986 年为基准，香港以 1986 年为基准，印度尼西亚以 1983 年为基准，泰国以 1978 年为基准，美国以 1978 年为基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 1980 年和 1985 年为基准。

(d) 香港为 1981~1985 年，印度尼西亚为 1983~1986 年，泰国为 1984~1985 年，EC 为 1980~1984 年。

(e) 中国为 1985~1989 年，印度尼西亚为 1986~1990 年。

(f) 文莱除外。

资料来源：(日) 山泽逸平、三和总合研究所编《亚洲太平洋经济——2000 年的幻想》，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3 年日文版，第 36 页。

人们之所以将东亚经济的崛起视为“奇迹”，主要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以往被人们看作是非常没有希望的地区，居然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成功道路。我们知道，自 18 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以农业——儒家文明为特征的东亚地区便开始走向衰落，除了拿破仑的那句“沉睡的巨狮”（指中国）的“赞喻”以外，人们充耳只闻“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代表着停滞、落后和专制主义的称谓；在战后初期，东亚各国、各地区均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独立后面对着原有殖民

统治的政治遗产，存在着权力重建与转移等种种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除中国大陆以外，东亚各国、各地区几乎都是资源贫乏、地域空间狭小、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各种可比经济指标大致仅高于非洲落后国家，再加上“冷战”格局、朝鲜战争、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和印度支那半岛战火重燃等方面的影响，东亚各国、各地区除日本以外，军事负担均非常沉重，等等。这些困难和不利条件的存在，使人难以相信东亚地区会很快摆脱贫困、动荡和落后的困境，在人们眼中，东亚地区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①。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东亚地区就以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日益充满活力彻底冲消了人们对它的悲观认识，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对此，人们有一个共识，即“东亚奇迹”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因而，探讨“东亚奇迹”的动因，研究“东亚模式”，自然成为一个世人关注的理论热点。

那么，何谓“东亚模式”，或者说，“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呢？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因为，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东亚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偏误：一是在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一般仅局限于 ANIES 和 ASEAN（近来还包括中国），而将日本视为一个“例外”；二是仅从某些特殊的角度将“东亚模式”看做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战略模式”，或者是“文化模式”等等，没有抓住“东亚模式”的本质。这两种偏误尤其是第二种偏误，是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东亚模式”问题研究日趋分歧和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从地理上讲是指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一般而言，可以

^① 参见罗荣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第56～57页。

将东亚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等；广义的东亚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东南亚即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诸国^①。就东亚“奇迹”或东亚经济的崛起而言，主要是指自 60 年代以来的 30 多年间，日本、ANIES、ASEAN 和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对此，人们一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涉及到“东亚模式”的国（地区）别研究对象和范围时，许多学者都将日本除外，只将 ANIES、ASEAN 尤其是前者置入视野。这恐怕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立场来看，难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二是与此相关，正是由于 ANIES 的经济起飞，“东亚模式”才成为举世瞩目的研究“热点”。

我认为，如果动态地、整体地进行考察，“东亚模式”所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应当是日本、ANIES、ASEAN 和中国。将日本列入“东亚模式”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中，除了考虑到地理属性以外，主要是因为：

(1) 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虽然人们对日本何时实现的工业化尚存争议，但我认为，以实现重化工业化这一标准来衡量，日本无疑是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日本走了一条同欧美先进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即它不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过程，而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觉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后发展的政治经济特征。

(2) 正因为如此，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战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颇为相似，既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也具有许多类似的解决方式及其特征。

^① 罗荣渠认为，若再扩而广之，还可以将南亚即印度次大陆也包括在内。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体制上，还是在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等方面，都无法将印度次大陆国家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混同起来。

在这方面，关于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同 ANIES 的相似性，已为人所共知，故姑且不论，仅从政治体制来看，日本与 ANIES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有明显的共性，即均属于一种“发展导向型”政治体制。虽然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导下，日本对天皇制进行了重大改造，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确立了形式上的西方式的多党议会制，但实际上，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多党制的形式下一直采取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这种日本特有的政治体制为保持战后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高速和稳定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3)日本是战后东亚地区连续性的后发展经济进程的起点。关于这一点，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在制度或经济体制等方面，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一个首先摆脱后发展阶段而成为发达国家一员的东亚国家，其成功的制度或体制方面的经验，对东亚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起了相当大的示范作用；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 ANIES 战后所实行的各具特色的“发展导向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人们很难否认，在战后东亚经济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制度或体制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具有明显的以日本为发端的经济增长的继起性和连续性。日本的资本和产业技术的海外转移及其由此逐步形成的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对 ANIES 的经济增长，起了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

(4)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它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 ANIES，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考虑到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特殊作用，对“东亚模式”的分析和研究，倘若抛开日本则必定是片面的或不全面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将日本作为研究“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对象，而且它在其中应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从“后发展经济进程”的角度分析“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还需阐明两点：一是由于 ASEAN 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大多是近十几年才开始的，不仅整体上尚未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 或 NIES）之列，而且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亦有很大差别（如菲律宾同泰国和印尼等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因而我在本书中暂且对其不做过多的分析；二是在本书中我不打算涉及中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汇入东亚经济体系之中同样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而且还在于中国与日本和 ANIES 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且中国的经济制度今天尚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当然，这里不涉及对中国后发展经济进程的分析，还有这样一种潜在意图：对任何事物的比较或者是借鉴，与其说进行生硬的对照，莫如通过对参照系的深入、透彻的分析，获得更为深刻的启发；况且所谓对照或比较，一旦触及到政治、经济制度或体制方面，一般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通过对与中国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且已经走完或者正处于后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历程的集中和深入研究，也许会达到更为完美的他石攻玉的目的。因此，本书分析和研究“东亚模式”的国别和地区对象，将主要集中于日本和 ANIES。

关于“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现阶段国内外学者的分歧颇大。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1)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认为“东亚发展模式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①

^① 参见慕海平：《东亚发展模式的含义》，《世界经济》1991年第9期，第24～26页。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也意识到了“东亚发展模式”的特殊含义，即国际环境、儒教文化以及“体制上的创新”，等等，但他所说的各种“体制上的创新”，仅是指“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相应的经济管理体制”。

(2)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这种观点同上一种观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认为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在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①

(3)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 ANIES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强力的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②

(4)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内化”、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③

(5)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关于伦理道德和正确人际群体关系的亚洲式价值观念体系——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

① 参见万光：《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探讨》，《亚太经济》1995年第2期，第3页；赵春明：《论亚洲“四小”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世界经济》1994年第11期，第68页；李琳：《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1期，第12~16页，等等。

② 参见王逸舟：《东亚模式的启迪与借鉴》，载于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441页。此外，美国学者罗纳德·芬德利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参见（美）温·赛伊·伍：《发展经济学的演变》，《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1期，第19页。

③ 参见沈华嵩：《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模式》，《世界经济》1992年第8期，第7页。

性”^①。这其中，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本质上讲，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效应，何况儒家还有浓厚的自由经济色彩与价格机能主张，并有一套明确而合理的经济发展策略”；而且，“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只有在专制政体不存在之时，才可以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②

(6) 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增长的过程同发展中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没有多大不同”，没有简单的东亚成功的诀窍，没有统一的“东亚模式”，因为东亚各国、各地区实行的“既非纯自由市场政策，也非纯政府干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③ 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东亚奇迹”。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东亚几只“小老虎”的经济高速发展，靠的是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因而不能持久，有朝一日将会遇到经济学所说的“报酬递减”问题，甚至会像前苏联那样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因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亚奇迹”，所谓“东亚奇迹”纯属夸大其词。^④

应当说，上述几种论点是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东亚模式”进行的各具特色的总结和归纳，而且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只是对东亚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某些现象或特征的具体描述，并未揭示“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社会政治体

① 参见沈华嵩：《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模式》，《世界经济》1992年第8期，第6页。

② 侯家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及其对台湾经济的贡献》，载于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③ 参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3年9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3年10月2日；(英)《经济学家》，1993年10月2日号，转引自《参考消息》1993年10月16日。

④ 参见吴敬琏：《“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改革》1995年第2期，第5~6页。

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分析“东亚模式”必须要抓住其最具共性的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从整体上讲，我们可以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方面，将“东亚模式”视为“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或“区域经济合作”模式。^①作为一种“制度模式”，“东亚模式”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理性且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是日本和 ANIES 后发展经济进程的共同特征，也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上述几种观点进行逐一评析。这里，从总体上可以将前两种观点视为一类。讨论这两种观点，自然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过去 40 年来，主要有三种理论思想。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以 W·W·罗斯托 (Rostow) 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和哈罗德-多马 (Harrod-Domar) 增长模型为核心，人们将经济发展主要地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概念上，把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连续的阶段或线性的过程；任何国家若要获取经济增长或进入“起飞阶段”，都必须具备适量的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总之，经济发展就是迅速的、总量的经济增长。这种线性经济增长理论很快为另外两种理论所取代。第一种是以 W

^①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 60~70 年代以来，以日本海外产业转移为发端的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东亚经济整体起飞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环境因素。虽然现阶段这种产业循环机制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但总体上讲是在日趋内向化。因此，如果忽视或抛开东亚地区特有的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就无法真正揭示“东亚模式”的内涵。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李晓：《论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经济》1995 年第 1 期，第 59~66 页。按照本书的原写作计划，“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模式”将专门作为独立的一篇进行分析。但考虑到篇幅有限，故此课题将留待以后作专门研究。